

September 2018

## Scholars' Caps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Rereading Detail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Ziyun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Ziyun. 2018. "Scholars' Caps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Rereading Detail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4): pp.56-6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4/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儒林“衣冠”与细节描写的体系化

——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刘紫云

**摘要:** 本文以《儒林外史》服饰描写中的头衣(俗称“帽子”)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细节与小说情节结构、主题思想之关系。通过对头衣类型及其特征的分析可知,为了照应小说“托明写清”这一时间框架,吴敬梓基本以明代服制礼仪为蓝本描写士林衣冠服饰;人物头衣是否与身份相符,成为吴敬梓观察士人群体言行出处的切入点之一。本文总结了与头衣密切相关的两类小说情节,讨论吴敬梓如何借由这一细节呈现科举制度下鱼龙混杂的士林圈和壁垒森严的士人内部分层。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吴敬梓“春秋笔法”的一部分,有关头衣的细节还被整合到小说家对儒礼议题的思考中,呈现出体系化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儒林外史》; 服饰; 帽子; 头衣; 细节; 体系

**作者简介:** 刘紫云,文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与明清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33号北京工商大学西校区教一楼505办公室,邮政编码:100048。电子邮箱: ziyunliu@yeah.net 本文系北京工商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中国古代小说日常物象描写研究”[项目编号: QNJ2016-03]的成果。

**Title:** Scholars' Caps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Rereading Detail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descriptions of scholars' caps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and investigates how this seemingly trivial detail connects to plot structure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novel. By examining types of cap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novel potentially deals with scholars of the Qing, when it comes to describing their costumes Wu Jingzi refers to costume rituals of the Ming so as to strictly fi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ing.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Wu Jingzi weaves details about caps into two main types of plot concerning disorder and chaos among literati circles an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within the hierarchical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conclusion, the cap not onl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structuring plot but also is well organized in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o reflect Wu Jingzi's contemplation on Confucian rituals.

**Keywords:**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caps; costume; details; holistic perspective

**Author:** Liu Ziyun, Ph. D.,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he specializes in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specially fiction and drama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ddress: Room 505, Building 1,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Fucheng Road 33,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48, P. R. C. Email: ziyunliu@yeah.net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Junior Faculty Fellowship of BTBU (QNJJ2016-03).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群体人物为中心展开叙事的长篇章回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儒林外

史》有别于前代“寓讥弹于稗史者”仅“集中于一人或一家”(226),吴敬梓“机锋所向,尤在士林”(226)。对士人

群体失范的观察和反思,构成吴敬梓创作的出发点,也决定了《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和思想深度。吴敬梓正是通过小说创作,呈现士林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创作出发点和全局观,统领了《儒林外史》的方方面面。哪怕是小说中有关衣冠服饰的细节描写,也体现出吴敬梓整体构思、通盘把握的艺术尝试。

## 一、托明写清： 以明代服制为蓝本的衣冠描写

“衣冠”本义为古代士人衣冠,后遂为士大夫、缙绅、士人乃至文明礼教之代称。《儒林外史》聚焦士人群体的世界,其所关注的也正是礼仪教化的大题目。《儒林外史》托明写清,从第二回至五十四回,起于明成化末年,终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跨越一百余年。为了照应这一故事时间框架,叙述者屡屡在情节中穿插解释“明朝体统”。衣冠服饰关乎舆服礼制之大事,也是明朝体统的一部分;小说中关于各个社会阶层的衣冠描写,也是在明朝礼制的大框架下展开的。

传统服装除身上所着之衣外,还包括头衣<sup>①</sup>和足衣。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阅读过程中,头衣往往在第一时间直接而清晰地标记出人物的身份、阶层和地位。《儒林外史》中的头衣描写往往出现在对话之前,或者与对话同时展开。头衣与人物身份、阶层、地位的相称或相违这样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却颇可揭示出礼仪制度的尊显或隳堕如此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并透露出小说家的叙述意图。

“方巾”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也是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头衣。士人便服,多以方巾搭配道袍,可证之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所忆前朝衣冠之制:“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197)。《儒林外史》中士人便服,多为方巾搭配直裰,这一描写基本符合明代服制。然而,此后满人入关,废汉人服制,顺治初年无论士庶皆禁戴方巾。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小帽”载:“明之士人类多方巾大袖者。至顺治甲申,则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而禁令苛暴,方巾为世大禁,虽巨绅士子,出与平民无异。间有惜犒羊之遗意,私居偶戴方巾者,一夫窥眄,惨祸立发。常熟有二生,于巡按行香日,戴方巾杂行众中,为所瞥见,即杖之数十,并题奏将二生磔之于市”(6195)。此处所叙为顺治元年及此后的情形。类似的记载,亦可见诸《阅世编》: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

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薙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辮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辮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簪,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纓,一如满州之制。(叶梦珠 198)

顺治二年,营兵改服满装,江南士人虽然剃发,但服制上仍从前朝旧式。顺治三年,彻底革除前朝旧制,尤其是便服头衣,由方巾改为暖帽、凉帽。清初官方对方巾下如此酷令,不仅因为方巾是前明遗制,更在于方巾是前明士人群体的象征。有清一代,士人公服、吉服皆戴顶帽,<sup>②</sup>与明代士人服制迥然有别。

《儒林外史》中有关士林衣冠的描写,总体依托明制,但也融入了清代的服制要素。“服装制式及流行变化往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吴敬梓注意到这种情况,通过一些具体描写以显示明代特色”(刘红军 161)。例如,第四十七回写五河县“一班是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襴衫、头巾”(吴敬梓 580),如前所论,方巾搭配襴衫正是明初生员的标准巾服样式。然而,并不是所有描写都依明制而来,也有掺杂清代服制特征的情况。例如,第二十八回提及方巾上缀“水晶结子”(吴敬梓 347),便是清朝服制特征的体现。这一回叙季苇萧在扬州招亲,金东崖、辛东之等人来庆贺,席间闲谈,话到扬州盐商,诸人不无含酸地讥诮一番。季苇萧说他近日听见扬州盐商是“六精”,辛东之说是“五精”,没听过“六精”,于是季苇萧说:“是‘六精’的狠!我说与你听!他轿里是坐的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这是‘五精’了。而今时作,这些盐商头上戴的是方巾,中间定是一个水晶结子,合起来是‘六精’”(吴敬梓 347)。在季苇萧等士流看来,盐商戴头巾已属荒唐不经,更为可笑的是,为了夸奢耀侈,盐商还要在方巾顶上结缀一颗水晶,实则有违体统,无知之至。所谓水晶结子,即顶珠之制。巾顶结珠,是金人四带巾的遗制。四带巾是金人常服,贵显者为了自耀其身,往往“显贵者于方顶,循十字,饰以珠,其中必贯以大者,谓之顶珠”(脱脱 984)。③《皇明通纪法传全录》载明太祖“克元都,诏衣冠悉复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其辮发、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于是悉复中国之旧”(陈建 84)。四带巾乃女真巾服,原非汉唐旧制,因此洪武三年下诏更令天下士庶改戴四方平定巾,亦即方巾。方巾不同于四带巾,巾顶不缀顶珠。季苇萧嘲笑盐

商不识体统处,便在于此。

清代的读者和评点者对这个细节心有戚戚焉,却是出于清人所特有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黄小田在评语中提出了质疑,他以为,所谓水晶结子,“其实是水精顶帽,托之明代,故曰‘结子’,然此系八九十年以前事,后来无不蓝顶矣”(吴敬梓 347)。黄小田认为,由于吴敬梓托明写清,故不提清人的顶帽、顶珠,而写明人的方巾、结子。顶帽、顶珠之制在清入关前既已有之,顺治初成为清朝服制要素。清代官吏所戴之帽名曰“顶帽”,为了区分官阶,在帽顶正中有金属小座,座上面安一个核桃大小的圆珠,珠的材质和颜色表示一定品级,珠子亦称“顶珠”。齐省堂本评语“从前五品水晶顶觉得尊贵之至,得之良非易也”(吴敬梓 347),正是针对清朝官吏顶帽上标志品阶的顶珠而言。黄小田所言之“蓝顶”,是指以蓝宝珠为官帽顶珠。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载康熙间顶帽、顶珠之制:“盖一品顶嵌东珠,二品大学士、尚书亦嵌东珠;三品红顶,四品蓝顶,各有等威,不准过也”(5)。由此可知,蓝顶在康熙朝是四品官员官帽上的顶珠。或许,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推测,生活于康熙、乾隆间的吴敬梓,受到生活经验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将清人顶帽顶珠之制巧妙地与明人方巾之制融合在一起了。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中的衣冠描写,总体上以明代服制为框架和蓝本,但个别处也掺杂、融合清代服制及特征。

## 二、儒林衣冠:头衣与人物层次

在《儒林外史》连环式的人物亮相中,先后出现了诸如高帽、瓦楞帽、毡帽、方巾、纱帽、小帽<sup>①</sup>、孝帽、红黑帽子、黑帽子、和尚帽子等数十种头衣。下文将就几种重要的头衣进行概述。

先来看高帽。王冕所戴的“高帽”,小说写得比较模糊,所谓“高”仅就其大致形状而言,非指某种特定形制的头衣。在贯穿“全书之血脉经络”(吴敬梓 15)的楔子中,王冕的一举一动无不投注了吴敬梓对理想士人的想象和诠释。王冕本不过是个放牛的村童,不到二十岁,博览群书,“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乘一輛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吴敬梓 5;第一回)。天目山樵以为,王冕高帽阔服、执鞭高歌的细节,皆“此元章实事,见本传”(吴敬梓 5)。宋濂《王冕传》有云:“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少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1474)。其中,“古冠服”为泛言,不特指“屈原衣冠”。明人陆应阳所撰《广舆记》卷十一载王冕“一试进士举,不第,焚所为文。

读古兵法,着高檐帽,着绿蓑衣,履长齿木屐,系木剑。或骑黄车持《汉书》以读。人咸目为狂士”(278)。此则将王冕“古冠服”落实为“高檐帽”“绿蓑衣”。小说中已指出,王冕穿戴之“高帽”“阔衣”,仿自“楚辞图”上的“屈原衣冠”。<sup>②</sup>《楚辞图》是根据屈原作品《楚辞》诗意所作的画作。明末陈洪绶所作《九歌图》《屈子行吟图》等均属此类(陈美林 14),其中后者所摹绘之屈原衣冠,近乎王冕高帽阔服之形状。王冕“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的品行,正是吴敬梓所推崇的,也是此后的士人群体所不及之者。衣冠摹古,前代有之。苏轼《次韵子由三首·椰子冠》诗中有云:“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2268)。在衣冠上追摹古人,正是“违时”“不合时宜”的表现,也是模仿者借以表明不媚于时、不流于俗的立场。王冕以乡间牧童之身,上蹈三闾大夫之衣冠行迹,足见其慕古、复古之心。

再来看瓦楞帽。“瓦楞帽”,又作“瓦垅帽”“瓦楞帽”,或即“纓子帽”“纓子瓦楞帽”“瓦楞帽”。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风俗》载:“瓦楞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1)。此种瓦楞帽,当为春暖至炎夏为取凉而戴。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中所描写的正是嘉靖之后“二十年外”之事,彼时瓦楞帽已然成为商人的头衣。第八回,春日问西门所戴正为“新纓子瓦楞帽儿”(85);第五十二回亦在春日,陈经济“头上纓子瓦楞帽儿”(636);第九十八回,“那时约五月,天气暑热,经济穿着纱衣服,头戴瓦垅帽”(1334)。“瓦楞帽”在《儒林外史》中总共出现9次,多为杂流头衣,诸如翟头役、夏总甲、陈和甫、景兰江、牛浦郎、鲍廷玺、张铁臂等人物均头戴瓦楞帽出现;其身份错杂,有胥吏头役(第一、二回)、医卜星相(第七回),更兼农商细民(第十七、二十一回)、倡优侠武(第三十一回),可归之于“杂流”。而且,戴瓦楞帽的时节也不限于春夏,第二回夏总甲戴瓦楞帽时便在正月初八日。

此外,“毡帽”也是庶民头衣,一般而言多于秋冬间为保暖而戴。《儒林外史》6次叙及头戴毡帽之人,分别是周进、范进、邹吉甫、九门提督齐老爷的仆役、倪霜峰、妓院龟头。整部小说中,除了倪霜峰以生员身份戴毡帽外,其余戴毡帽者皆为庶民。第二十五回叙述者通过鲍文卿之眼写倪霜峰,十月初一日“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脚下一双烂红鞋”(吴敬梓 311)。倪霜峰是进过学的秀才,本该戴头巾,但由于窘困潦倒,弃考改志,以修补乐器为生,自以为辱没士人身份,故改戴毡帽。由头巾改戴毡帽,正象征了倪霜峰由士流退居杂流的人生选择,其穷途末路的选择或许更能代表大多数底层士人的处境。

与杂流的“瓦楞帽”“毡帽”相呼应的,则是士流的“方巾”“头巾”和“纱帽”。不仅如此,“方巾”“头巾”和“纱帽”还标记出土人群体内部的层次差异与品味分化。“方巾”即“四方平定巾”,洪武初年为士庶、吏员通用的头衣,洪武末年成为生员以上士人专用头衣。《大明会典》

卷六十一“士庶巾服”载：“洪武三年定：士庶初戴四方巾，今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申时行 249）。“吏员巾服”载：“洪武四年定：各衙门掾史、令史、书吏、司吏、典史，穿皂盘领衫，系丝绦，戴四方平定巾”（249）。可见，在洪武四年前，无论士庶、吏员，都戴一样的头巾。一直到洪武三十年，才规定“令史、典史皆服吏巾，巾样不与庶民同”（249）。至此方巾才成为士人专属头衣。此后，方巾又为明代生员以上士子的头衣，甚至用来指代生员。生员俗称“秀才”，《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叙匡超人看见马纯上“戴着方巾，知道是学里朋友”（吴敬梓 198），第十七回景兰江“看见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220），由此可知，在学生员均戴方巾。“方巾”在《儒林外史》中出现了 72 次，涉及人物多达 40 位；“头巾”出现 15 次，所涉及人物基本在戴方巾之列。《儒林外史》中的“头巾”等同“方巾”，例如第七回荀玫进学，乡人来贺，都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挣了这一顶头巾”（吴敬梓 95）。第十七回景兰江对匡超人道：“你道这书单是戴头巾做秀才的会看么？”（221）。除了庶民吉服中的“纱帽”之外，作为品官身份象征的“纱帽”，总共出现了 35 次，涉及张静斋、严贡生、鲁编修、董孝廉、高老先生、萧云仙、方六老爷、万中书等候补贡生、在朝官员或致仕乡绅。

综上所述，在《儒林外史》所叙及之数十种头衣中，有关“方巾”“头巾”的描写最多也最为显著，而“方巾”“头巾”所代表的真假士人也正是吴敬梓最为关切的群体。

### 三、“遍地是方巾”：杂流的本分与僭越

顾名思义，《儒林外史》以“儒林”即文士群体为主要创作对象，正如第三十七回卧评所言“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学士，不为少矣”（吴敬梓 465）。然而，纵览全书便不难发现，小说中“有名姓人物七十多，个性鲜明的至少二、三十个。所写人物，儒者名士，官绅吏胥，医卜星相，娼妓劫窃，农工兵商，市井细民，无所不有”（黄秉泽 484）。这也就无怪乎天目山樵读到沈琼枝等人名列“幽榜”时质问：“和尚、拳师、妇人俱得谓之儒林耶？”（吴敬梓 680）。然而，在吴敬梓的笔下，杂流不仅没有溢出儒林的范围，反而被纳入到一个动态的历史场景中，成为观察、叙述儒林群体的十分有益的参照系。

出于依托明制之故，《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衣冠僭越现象，与明代中后期的情形若合符契。从小说对头衣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吴敬梓十分关注杂流混戴方巾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明代后期以来的士林乱象之一。《阅世编》中记载明后期，

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必缙绅子弟也。不然，则

医生、星士、相士也。其后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屑与庶人伍，故亦间为假借，士流亦优容之，然必诗礼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为世俗所指摘，不然将群起而哗之，便无颜立于人世矣。（叶梦珠 197）

方巾本来是区分士民身份的标志，而那些出身衣冠世家又未能入学的子弟，为了标榜与民不同，便假借方巾冒充士人，对于这一类人，士流尚持宽容态度。等而次之的，则是像医生、星士、相士等与士人接触较多的一类人，假借方巾混迹士林，也是士流尚可接受的。《儒林外史》中如医生赵雪斋、相士陈和甫都可归入此类。至于平民布衣，无任何背景、资历而忝列衣冠者，会受到世人指摘。更有甚者，倡优隶卒等贱民冒充士流者，则世人将群起而攻之。《儒林外史》中戏行钱麻子、黄老爹冒充士林，为鲍文卿暗中点破；妓院龟头王义安冒充士人，为仪征学霸当场揭发殴打，皆属贱民冒充士流一类，情况更为恶劣了。

明人左懋第《严禁奢僭以挽风俗以息灾沴示》对晚明服制僭越尤其是混戴方巾、逾越本分的现象，不遗余力地加以斥责并告诫后人：“方巾所以别士民，而见各项人俱乱戴之，示后方巾止许生员及有前程人戴。武生有学校之名、乡约有教民之任并戴方巾，而童生及幼稚戴片玉巾及凌云等巾，千把总官俱戴将巾，凡术士等杂项人戴一字巾，俱不许混戴方巾。违者责究”（819）。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亦记载明末“戴巾之滥”：

《语窥今古》晋汉唐之巾，儒者之冠。明兴，科甲监儒兼而用之，非真斯文尽戴小帽。其后渐至业铅槧、赋诗章者戴矣。迹来一介小民，未闻登两榜而入黉宫，一丁不识，骤获资财，巍然峨其冠，翩然大其袖，扬扬平康曲里，此何巾哉？曰银招牌也，否则曰省钱帽也。一人侥幸科第，宗族姻亲尽换儒巾，曰荫袭巾也。谚有“满城文运转，遍地是方巾”之谓。安得科道一疏厘而正之，不然朝廷差巡巾御史，揽轡中原，遇则杖而裂之，不亦快哉？○崇祯末有一人卖丝而业医，家富饶遂戴巾，人谓之药师巾。（652）

上文一系列杂流僭戴方巾的现象中，其中“业铅槧、赋诗章者”是书商、作诗的名士，“一介小民，未闻登两榜而入黉宫，一丁不识，骤获资财，巍然峨其冠”或即指目不识丁的商人，而“翩然大其袖，扬扬平康曲里”则更是嫖客了。《儒林外史》中也不乏这些杂流，甚至可以一一对应起来。综观全书，这一僭越现象先后牵涉陈和甫（星相术士）、权勿用（乡民布衣）、洪憨仙（星相术士）、匡太公（乡民布衣）、赵雪斋（医生）、支剑锋（巡商）、牛浦郎（小本生意人）、方六老爷（徽商）、丁言志（布衣）等杂流人物，以及

王义安(妓院龟头)、万雪斋(曾为隶)、钱麻子、黄老爹(优伶)等“倡优隶卒”贱民阶层。其中,如支剑锋以巡商兼名士的身份戴方巾,万雪斋曾为隶卒、后以盐商的身份戴方巾,丁言志戴方巾上妓馆,这些都可以和清初人笔下所载晚明方巾泛滥的现象一一对应。此外,匡太公去世后,匡超人彼时已进过学,是个秀才了,便“合着太公的头,做了一顶方巾”(吴敬梓 218;第十七回)。这一情节便与上述引文中所谓“荫袭巾”如出一辙,即上文所谓“一人侥幸科第、宗族姻亲尽换儒巾”。天目山樵评点质问这一僭越现象的荒谬道:“秀才亦可貤封乎?”(吴敬梓 218)。

这类描写并非零碎无章的,而是成体系的,反映出吴敬梓对士林世界进行整体观照的视角。吴敬梓的这一关切态度,在后来评点者的点评中得到了呼应和验证。清代评点者对这些细微差异十分敏感,往往会提示读者留意这样的“春秋笔法”,或暗示或直接予以嘲讽抨击。例如,陈和甫初次出场时,在荀玫、王惠寓中为两位进士算功名,彼时“头戴瓦楞帽,身穿茧绸直裰,腰系丝绦”(吴敬梓 97;第七回),及至再次出场,则现身娄府门外,为鲁编修千金提亲,“头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茧绸直裰,像个斯文人”(吴敬梓 133;第十回),以至于娄氏兄弟误以为是他们渴慕已久的杨执中先生登门造访。黄小田评本于此处点出:“前在京戴的瓦楞帽”(133)。类似的提示也出现在对权勿用的评点中。权勿用初次亮相时“热孝在身”,“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吴敬梓 158;第十二回)。待孝期满了,进城见娄氏兄弟,却连衣服也不换,一顶高孝帽又在途中被一根尖扁担挑去了,只穿着一身白、科着头来至娄府。幸好娄氏公子不在府上,杨执中代公子迎接上宾,见此窘状,不免愁眉不展,“叫他权且坐在大门板凳上,慌忙走进去,取出一顶旧方巾来与他戴了”(吴敬梓 160),之后参加莺脰湖大会,权勿用没有合适衣服穿,公子“又取出一件浅蓝绸直裰送他”(162)。权勿用穿孝服、戴方巾的怪模样,引来天目山樵的讥讽:“孝服而戴方巾,奇矣;而二公子不以为非,更奇”(吴敬梓 160)。及至权勿用换上了直裰,天目山樵又嘲讽道:“浅蓝绸直裰乃与方巾相称,程朱学问的人不以夺情为嫌”(吴敬梓 162)。然而,天目山樵并未指出权勿用戴方巾乃逾制之举。黄小田指出,权勿用“考了十数回不入学,无故却孝服戴方巾”(吴敬梓 160),不仅不配戴方巾,而且在服丧期间戴方巾也不合礼制。此后,扬州盐商万雪斋头戴方巾出场,又为天目山樵和黄小田分别点出:“万雪斋戴方巾”,“又是一个方巾”(吴敬梓 282)。

杂流混戴方巾、冒充士流,本不合礼,情节严重者还要绳之以法。第十八回匡超人与西湖名士春游赋诗,回城迟了,被分管盐务的同知撞见。内中有个名士支剑锋本分是个巡商,盐捕分府认得,“看见他戴了方巾,说道:‘衙门巡商,从来没有生、监充当的,你怎么戴这个帽子!左右的,挝去了!’一条链子锁起来”(吴敬梓 236;第十八

回)。当然,这样绳之以法的情形在小说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未被拆穿、瞒天过海。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中混戴方巾的杂流,多选择在外地招摇撞骗。由于僭越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除非被熟人撞见并揭发,否则多能掩人耳目、招摇过市。以杂流跻身士流而得逞者,无过于牛浦郎。牛浦郎跟着祖父生活,本是小本生意人家出身,后来冒牛布衣之名,结交达官贵人,继而出走芜湖,认牛玉圃为叔祖。第二十二回牛玉圃要去盐商家招摇撞骗,为了让牛浦郎撑门面,“拿出一顶旧方巾和一件蓝绸直裰来,递与牛浦,道:‘今日要同往东家万雪斋先生家,你穿了这个衣帽去’”(吴敬梓 281)。天目山樵点出:“牛浦郎戴方巾”(吴敬梓 281)。及至牛玉圃发现自己中了牛浦郎之计,思量报复,将牛浦郎臭打一顿,扒光了衣服,丢在岸边。牛浦郎被过路船家救起,

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样人,被甚人剥了衣裳捆倒在此?”牛浦道:“老爹,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那客人[……]看见他精赤条条,不像模样,因说道:“相公且站着,我到船上取个衣帽鞋袜来与你穿着,好上船去。”当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双鞋,一顶瓦楞帽,与他穿戴起来。说道:“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权戴着,到前熱鬧所在再买方巾罢。”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谢那客人。(吴敬梓 292)

船家只有瓦楞帽子,拿给牛浦郎戴,黄小田于此处评曰:“正是他戴的”(吴敬梓 292)。然而牛浦郎已学会假戏真唱,口口声声称自己为秀才。船家没办法,只得抱歉地委屈牛浦郎先戴瓦楞帽子,稍后再买方巾戴。天目山樵此处批曰:“还是方巾余波”(吴敬梓 292)。在小说评点家眼中,瓦楞帽与方巾之争,正是于无声处见风雷,牛浦郎的自欺欺人与钻营虚伪昭然若揭。

更有甚者,“倡优隶卒”等贱民阶层也有僭戴方巾、冒充士流者,而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可能被当面揭发,甚至还将遭遇暴力殴打。小说第二十二回牛玉圃带着牛浦郎在仪征停船,上楼便逢戴方巾的老友,

正说得稠密,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前面一个穿一件茧绸直裰,胸前油了一块,后面一个穿一件玄色直裰,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走了上来。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那穿茧绸的道:“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娘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那穿玄色的道:“怎么不是他?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

如捣蒜,两个秀才越发威风。(吴敬梓 280—81)

王义安本为妓院龟头,却公然戴方巾上酒楼,若非被两个学霸揪住,恐怕还很义正辞严。天目山樵评云:“此回从方巾上生色,而以大观楼一闹为主。盖方巾之不足为轻重久矣”(吴敬梓 284)。这也是吴敬梓之深恶痛绝处,即各色人等冒充士人,致令士林鱼龙混杂,江河日下。

然而,吴敬梓并不停留于呈现杂流僭越本分、招摇士林的集体乱象,在冷眼旁观之时,他还尝试为士林时弊把脉出方。吴敬梓笔下的杂流,并非都如此不堪。鲍文卿便是杂流乃至贱民中的一股清流。安分守己是鲍文卿这一人物身上至为关键的品格,同时这一点也被吴敬梓塑造为杂流和贱民的典范。在鲍文卿出场之前,吴敬梓已零星叙及杂流尤其是贱民中安守本分的几个人物,如秦老爹、邹吉甫、卜老爹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些人物的欣赏。至鲍文卿出,则近乎激赏。鲍文卿身居下贱,言行出处却可为士流借镜,故评者有云“特写鲍文卿,所以愧士大夫也”(吴敬梓 305)。鲍文卿的安分守己,不仅体现在他与士林人物交接中对自我身份与地位的省察、谨守礼法而不逾矩的作风,而且还体现在他对戏子同行逾礼行为的劝改与匡正。小说第二十四回叙鲍文卿从北京回到南京老家,寻人修理乐器、整顿戏班,出门上茶馆会同行,

才走进茶馆,只见一个人坐在那里,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独自坐在那里吃茶。鲍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鲍文卿道:“我方才远远看见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爷[……]。”当下坐了吃茶。[……]鲍文卿道:“[……]像这衣服、靴子,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这样衣裳,叫那读书的人穿甚么?”钱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鲍文卿道:“兄弟,你说这样不安本分的话,岂但来生还做戏子,连变驴变马都是该的!”钱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茶馆里拿上点心来吃。(吴敬梓 307—308)

鲍文卿阔别南京十四年,言行出处不改其旧,但他的同行却已是今非昔比。钱麻子本是戏班唱老生的,属于“倡优隶卒”贱民阶层,却公然穿着翰林、科道老爷衣巾出入茶馆酒肆。更有甚者,连本该持重的老者也尽失体统,耻言戏行,攀附士流。鲍文卿跟钱麻子吃点心,见一个老老上来,

头戴浩然巾,身穿酱色绸直裰,脚下粉底皂

靴,手执龙头拐杖,走了进来。钱麻子道:“黄老爹,到这里来吃茶。”[……]鲍文卿道:“[……]记得我出门那日,还在国公府徐老爷里面,看着老爹妆了一出《茶博士》才走的。老爹而今可在班里了?”黄老爹摇手道:“我久已不做戏子了。”[……]鲍文卿道:“[……]”。又道:“钱兄弟,你看老爹这个体统,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书、侍郎回来,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吴敬梓 308)

叙述者唯恐读者读不出鲍文卿的讥刺之意,一违前文节制的语调,直接骂道:“那老畜生不晓的这话是笑他,反忻忻得意”(吴敬梓 308)。鲍文卿见到钱麻子时,虽眼里看不惯,却仍存回转之念,先以拳拳之心劝诫之,晓之以理,继而动之以情。及至见到黄老爹,自知礼法隳堕已非一人之力可挽,虽不至于嬉笑怒骂,却也明褒暗贬乃至于讥消挖苦。吴敬梓将鲍文卿置之于此鲜明的对比中,也正是为了凸显其安守本分的难能可贵。行文至此,士林颓势尽显,杂流乃至贱民皆戴方巾,而倪霜峰等落魄士人却被迫戴瓦楞帽,两相对照,尤见士林乱象之积重难返。

综上所述,杂流乃至贱民混戴方巾、冒充士流的情节主要出现在小说前二十五回中,共同勾勒出士林鱼龙混杂的面貌。借由对头衣与阶层身份的相称或错忤系列现象的呈现,吴敬梓显然有意于将服制上的紊乱与礼法之隳堕相联系,并为小说下半部重建礼仪的努力和思考作铺垫。总而言之,杂流和贱民在《儒林外史》中的意义有二:一、不安本分的杂流和贱民,摇身一变而为假士人、假斯文,致使士流鱼龙混杂;二、安于本分的杂流和贱民构成士流的参照系,其言行出处莫不与失范的士流形成对比。

#### 四、“满城文运转”:士流的升迁与倒退

与明清科举考试的程序以及从地方到中央的科考等级相对应,士人群体内部存在等级层次的分化,而不同层次士人所着头衣正可为我们辨别士人群体内部的分层提供较为清晰的标记物。《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儒修表中将“儒林”分为十一类,分别为: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武途出身已登仕籍、例不得入翰林院者,举人,荫生,贡生,监生,生员,布衣,释子,道士,女子。其中前七类都是明清学校制度与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士人阶层。此外,尚为布衣的童生可充士人后备军。

方巾与特定服饰的搭配,可以区分士林内部的不同层次。《明史·舆服志二》载洪武二十四年,命生员乃至贡举入监者皆服襕衫(张廷玉 1649)。襕衫,又称“蓝衫”。因此,方巾、襕衫是洪武末年到仁宗年间生员及以上士人的标准巾服,以区分于庶民和吏员。仁宗朝以后,

有别于普通生员,监生巾服改为方巾、青圆领。此后,生员以上的士人头衣形制略有变化。《阅世编》卷八载明未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同戴儒巾,“闻举人前辈俱带圆帽,如笠而小,亦以乌纱添里为之。予所见举人与贡、监、生员同带儒巾,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取其端重也。举、贡而下,腰束俱蓝丝绵条,皂靴与职官同”(叶梦珠 197)。徐树丕《识小录》卷一“国朝器制”云:“国朝创制器物前代所无者:儒巾、襕衫、摺扇、围屏、风领、酒盘一名护衣盘、四方头巾、网巾、水火炉”(60)。由此可见,儒巾形制与方巾不同。然而,《儒林外史》中未涉及对“儒巾”的描写。因此,从《儒林外史》的头衣描写出发,以生员和举人为分界点,生员以下童生的头衣与庶民同,多为毡帽、瓦楞帽;生员至举人,包括荫生、贡生、监生,常服头衣为方巾;中进士第而登仕籍者,公服头衣为纱帽,便服头衣为方巾。从头衣的角度看,毡帽或瓦楞帽、方巾、纱帽的次第变换,可以标记出科举制度下士人群体的升迁轨迹。

整部《儒林外史》便从一顶“旧毡帽”开始。第一顶毡帽出现在第二回薛家集延请周进为村学西宾的情节中,那时正值正月十六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玄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吴敬梓 21)。小说所叙在正月间,周进着红鞋乃是时俗。《云间据目抄》卷二“风俗”载:“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范濂 2)。因此,旧毡帽、旧直裰、破了洞的袖子以及旧大红绸鞋,共同构成了这个久困场屋、落魄潦倒的老童生面貌。此时的周进是科举制度中最底层的一员,而薛家集又是小说所依托的明代版图中微乎其微的一个小地方。小地方的小人物——戴着旧毡帽的老童生,正是吴敬梓对科举制度和士人群体进行整体性观照和反思的起点,也是吴敬梓对士人个体精神世界进行深度观察和刻画的起点。

首先,吴敬梓将周进这位老童生的出场与科举制度中阶段性的成功者——秀才与举人——并置,后二者的先后出场及其与周进的交接场面,构成了童生与秀才、举人的横向对比,并进一步勾勒出士人阶层内部的分化和层次。正如卧闲草堂本评云“旧毡帽与新方巾相映”(吴敬梓 21),周进作为老童生的尴尬、屈辱处境,在梅玖这一新秀才的映衬下可谓穷形尽相。这是书中第一顶方巾,梅玖是书中第一个秀才。此后,王惠作为前科新中的举人,“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出场,从其与周进的交接中可看出,王惠几乎视周进为无物。清明日王惠扫墓归来,正值雨天,遂领从人借宿观音庵,次早走人,“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吴敬梓 27)。正如天目山樵所评“见了举人该修弟子职”(吴敬梓 27),老童生在举人面前之卑微及所遭受之冷落与轻蔑,直令人惨然。所幸吴敬梓为周进选择了一条更富于戏剧性的青云之路,而这种戏剧性正暗合科举制度的逻辑。

这便是“旧毡帽”的第二层意义,即借由一系列戏剧性骤变与升迁,周进的命运象征了士人个体在科举制度中所能经历的荣辱两极,由士人群体的底层不断向上直至科举考试的最顶端——进士,并由此进入仕途。吴敬梓仅用只言片语叙述了周进在士人群体内部的升迁和地位之反转。周进在生意人的帮助下捐了监生,由上文所引史料可知,其巾服当与生员无异,彼时当改着方巾、襕衫。此后乡试、会试一帆风顺,中了进士,钦点广东学道。其赴任之时,又当为纱帽、圆领。虽然二者不为作者所提及,然却不妨推测而得。周进到广东考生员,考到第三场南海、番禺两县童生,“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吴敬梓 34;第二回)。天目山樵评曰:“破毡帽算是周先生衣钵”(吴敬梓 34),这样的细节安排并非偶然。范进也是以落魄老童生的形象出场,此后在周进的提拔下考取案首,进了学,继而又顺利中举,从相公而老爷,立即跻身士流上层,与身着纱帽、圆领的张乡绅分庭抗礼。因此,从周进与范进的个体角度看,从破毡帽到方巾、纱帽的变化,正标记出了士人个体在科举制度中的升迁轨迹。

然而,正如楔子中王冕所言“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伴随着地位的升迁与声名、财富的积累,士人的品行却每况愈下。最典型的莫过于匡超人,可谓集地位升迁与品行倒退为一身。他刚刚出现时还只是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质朴白丁,在客店中邂逅老秀才马纯上,“马二先生见他乖觉,问道:‘长兄,你贵姓?可就是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见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学里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温州府乐清县住。’马二先生见他戴顶破帽,身穿一件单布衣服,甚是褴褛”(吴敬梓 198;第十五回)。匡少年与马纯上相互从对方的巾帽上读出了彼此的身份。马纯上出于同情斯文之心,资助匡少年返乡侍亲。后来匡少年进了学,脱去了帽子,戴上了方巾。方巾与瓦楞帽,分别代表了两种身份群体与言行出处。瓦楞帽与方巾的差别,一望可知,

匡超人[……]走进饭店,见里面点着灯,先有一个客人坐在一张桌子上,面前摆了一本书,在那里静静的看。匡超人[……]走到跟前,请教了一声“老客”,拱一拱手。那人才立起身来为礼,青绢直身,瓦楞帽子,像个生意人模样。两人叙礼坐下。匡超人问道:“客人贵乡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这五十里外,因有个小店在省城,如今往店里去,因无便船,权在此住一夜。’看见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吴敬梓 220;第十七回)

此时的匡超人已是进了学的秀才,而景兰江却只是个在



杭州城里开方巾店的生意人。匡超人不解他既做生意，为何又看书，景兰江却反问匡超人：“你道这书单是戴头巾做秀才的会看么？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吴敬梓 221；第十七回）。以匡超人的乖觉逢迎，很快便被杭城名士圈所接纳，继而又崭露头角于选家圈，可谓左右逢源、触处逢春。然而，正如黄小田评语所云：“他偏有许多遇合，而爱之适所以害之”（吴敬梓 247），名利的诱惑也在不断侵蚀他为人处世的底线，而作为士人的底线终于在结识潘三后彻底失守。匡超人经由潘保正之荐，结识了杭州城衙吏潘三，领受他许多人情，也不免替潘三效劳——为金东崖的儿子替考。潘三出计让匡超人先冒充军牢夜役混入考场，之后同金东崖的儿子互换行头，匡超人再冒充童生进入考场参加童生试，

潘三打听得宗师挂牌考会稽了，三更时分，带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门口。拿出一顶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条红搭包来，叫他除了方巾，脱了衣裳，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超人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吆喝了进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换过来。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吴敬梓 245；第十九回）

黄小田评本注意到匡超人的头衣从方巾更换为高黑帽这个细节，点评道：“童生而高帽矣”“方巾而高帽矣”（吴敬梓 245）。《阅世编》卷八载：“其衙门杂役，如皂隶则漆布冠岸帻，而网巾外见，旁插孔雀翎毛，服下截细褶青布衣，腰束红布织带”（叶梦珠 197）。小说中的描写，与此相契合。由此可见，高黑帽、青布衣服、红搭包，是典型的衙役装束，而衙役与生员本自有不可逾越的等级差异，这种差异正是通过服饰外化并固化的。然而，在替考的场景中，匡超人的头衣从方巾而黑帽，有着霄壤之别的身分隔阂和等级差异，就在匡超人轻而易举的头衣更换中被逾越、消弭了。士人品行的倒退乃至堕落，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富于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毫无操守的士人，很快补了廪生，又以优行贡入太学，候补教习之缺。此后，匡超人重婚再娶时，所着便是官员吉服，“纱帽圆领，金带皂靴”（吴敬梓 252；第二十回）。

如前所述，杂流僭越本分、冒戴方巾，是为了跻身士流；然而，置身士流的士人，在科举体制中又被分成三六九等，以至于秀才瞧不起童生，为官的瞧不起当秀才的。正如第四十九回施御史对迟衡山和武书毫不掩饰的不屑：“这两个人却也作怪。但凡我们请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说他当真有事，做秀才的那里有这许多事！若

说他做身份，一个秀才的身份到那里去！”（吴敬梓 601）。士人圈内部存在的层级隔阂，使得一些居于较低层次的士人，为了获得进入高层士人圈的入场券，用尽心机、铤而走险。第五十回中万中书本是个穷秀才，“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个秀才，只好喝风痴烟。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610）。因此，他便冒充七品中书，着纱帽、补服，与御史、翰林交接，后因一场官司，险些东窗事发，却侥幸得旁人捐资保举，自己一分钱不费，既洗脱罪名，又谋得真官。假万中书被差人带到衙门里时，依旧纱帽、补服，后来凤四老爷去衙门探望他，见状不堪，“脱下外面一件长衣来，叫万中书脱下公服换了”，“又除去头上的帽子，叫万中书戴了”（609）；及至秦中书、施御史出钱弄权，为假中书谋得真官，凤四老爷遂吩咐万中书：“明日仍旧穿了公服到这两家谢去”（613）。

士流除了僭越本分、冒充更高层次士人之外，有时候也会降低本分、改换巾服，此种情形往往用来掩人耳目，逃避因其有污士林的德行而可能招致的道德压力。以“青衣小帽”的装束为例，《儒林外史》中总共出现4次，一次是写差人，一次写戏子鲍文卿，另外两次分别写荀玫和王惠。《阅世编》卷八载：“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叶梦珠 197）。可见，青衣小帽是隶卒之辈的巾服。第七回“到晚，荀员外自换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两位老师，求个保举”（吴敬梓 100），正是荀玫希图匿丧之时。第八回王惠逃窜之时，恨不得改头换面，遂“只取了一个枕箱，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换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吴敬梓 108）。王惠、荀玫是书中成对出现的两个人物，恰好一个不忠，一个不孝，也只有此二人曾着“青衣小帽”。

综上所述，头衣的变换不仅标记出土人在科举体制中的升迁轨迹，而且在特殊的场合中，还标记出土人文行出处上的倒退。

## 结 语

对小说人物衣冠服饰进行描写，属于古代小说描写人物外貌、塑造人物形象的传统手法。《儒林外史》中的衣冠服饰描写，既继承了古代小说的这一手法，同时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首先，从小说创作技法的角度看，吴敬梓对衣冠服饰的描写，在遵循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又有所调整，其中不少描写从程式化描写中独立出来，以春秋笔法运之，成为情境化、情节化的细节描写，蕴含了小说家的褒贬。对人物外貌、服饰进行描写的传统，可追溯至说话表演中的人物亮相。及至《水浒传》以来的长篇章回小说，在人物初次出场时，往往也会给人物一个特写，从人物五官面容写起，继而写其穿戴服饰，从头到脚描摹一遍。这样的特写在《儒林外史》前的小说中已成为一个惯例和程式，也能

在《儒林外史》中找到大量的例证。然而,《儒林外史》中不少描写,例如上文所论及之头巾之争、真假纱帽,则都在头衣上做文章,而有关的头衣描写属于情境化、情节化描写而非程式化描写。程式化描写往往是超情节、独立于情节之外的,而情境化、情节化细节描写则与人物性格变迁、情节推进乃至小说主题发生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史传春秋笔法的借鉴而得以实现的。吴组缃提出,吴敬梓的讽刺艺术是取传统的史家态度而加以发展,堪称“史笔”,“作者并没有直接对我们褒贬什么,但那种种形象却无处不含有巨大的褒贬”(33)。关于头衣的描写,莫不包含小说家的褒贬态度。这样的创作手法,相应地要求读者“必须从各个场合形象的关联上、发展上来作体会和了解”(33)小说家的褒贬态度。如前文所述,对牛浦郎、匡超人等人物性格、人格的塑造,无不是在一个发展的时间进程中呈现的,而对此二人头衣的细节描写正是小说家寄寓褒贬之处。当我们将二人前后的情节段落并置关联时,便不难看出二人的堕落过程。

其次,从小说主题和结构上看,《儒林外史》中有关头衣的细节描写,被整合到对儒家礼仪之堕落的观察、反思与重建的框架下,并由此获得了进行体系化和整体化观照和理解的可能,也为我们检视《儒林外史》的长篇结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试图从整体上观照士人群体的精神世界,从制度、文化上反思广泛存在于士人群体乃至社会各个阶层的问题。因此,与以往的章回长篇不同,富于思想深度的主题取代了人物成为贯穿小说的线索。吴敬梓将小说的背景放在明代,用意非浅。明初朱元璋钦定颁布针对各个社会阶层的服饰制度,整顿元人遗制,恢复汉人体统。舆服之制是儒家礼仪很重要的一部分,体现了儒礼的社会阶层观和秩序观。《儒林外史》中无论士流、杂流,其中巾服特征基本符合明人服制特征,亦即汉人服制,而几乎看不到小说家对清朝服制特征的正面反映,这显然是经过小说家的设计和经营的。通过头衣的细节描写,吴敬梓不仅呈现出某个具体人物的形貌,而且还将某一具体人物纳入到群体谱系中,在横、纵向的对比中呈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如上所述,瓦楞帽、毡帽是杂流以及未入士流之童生的头衣,方巾是跻身士人阶层的一个外在标志,而乌纱帽则更是仕途、权势的象征。《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无论杂流还是士流,其中巾服的僭越与假冒成为一时之流弊:进不了学的小生意人想冒充秀才,丢了瓦楞帽戴方巾;进了学久考不中、落魄江湖的秀才又一想结交权贵、当大官,于是就丢了方巾戴乌纱帽。无论是“瓦楞帽”、“方巾”/“头巾”还是“纱帽”,在这一长篇中是自成体系的,三种不同的描写将儒林群体划分成可识别度较高的三种身份与阶层;这三种描写所对应的三种阶层与身份,又共同勾勒出儒林全体。这种整体性的效果是短篇小说所不可比拟也难以实现的。

最后,从小说史的角度看,细节描写折射出古代小说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然而,这一过程既包含了演变与发展,同时也包含了齐头并进的多元并存。与《儒林外史》几乎同时期的《红楼梦》,其细节描写“往往大有深意,与人物的身份、心理、性格和全书的主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勇强 442),更专注于对个人性格的深度塑造,体现出“精致化”的倾向。“从小说原初形态往往只是‘粗陈梗概’,到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细节的夸张化,再到一些话本小说及世情小说细节描写的趋于真实,乃至《红楼梦》细节描写的精致化的变化,本身也构成了小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细节”(刘勇强 445)。那么,就头衣的细节描写上看,《儒林外史》的细节描写则是以体系化、整体化取胜,而且将抽象的儒礼问题具象化,十分有力地勾勒出士林群体文行出处的变迁,呈现出吴敬梓对儒礼之堕堕进行反思、重建,复归于迷惘的思想历程。

#### 注释[Notes]

- ① 俗称“帽子”。
- ② “会试中式贡士朝冠,顶镂花金座,上衔金三枝九叶[……]状元金顶,上衔水晶。[……]举人公服冠,顶镂花银座,上衔金雀。公服袍[……]公服带[……]吉服冠[……]贡生吉服冠,镂花金顶,余同举人。监生吉服冠,素银顶,余同贡生。生员冠,顶镂花银座,上衔银雀。公服袍,蓝绸青缘。披领如袍式。”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1册,第3063页。
- ③ 中华书局原文作:“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这一标点实则有误,当作“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
- ④ 即“六合一统帽”。
- ⑤ 有关屈原衣冠形状的描摹,尚可见诸明清两代的名人画像图赞,如《历代名人像赞》(弘治戊午1498年)、《历代圣贤像赞》(万历癸巳1593年)、(彩绘)《历代圣贤图像》(约1600年)、《历代圣贤名人像》(清南薰殿藏)等。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陈建 高汝栻 吴桢:《皇明通纪法传全录》,《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Chen, Jian, Gao Rushi, and Wu Zhen. *Comprehensive Imperial Records and Laws of the Ming.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357.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陈美林:《陈批儒林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 [Chen, Meilin. *Chen's Commentary o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褚人获:《坚瓠集》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Chu, Renhuo. *Miscellaneous Notes of Hard Gourd*.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 范濂:《云间据目抄》。奉贤褚氏重刊本,1928年。
- [ Fan, Lian. *Transcript of What I Saw in Yunjian*. Reprint by the Chu family in Fengxian, 1928. ]
- 黄秉泽:“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李汉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482—97。
- [ Huang, Bingze. “On the Artistic Structure of the Full-length Novel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Collected Papers o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482—97. ]
-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 [ Lanling Xiaoxiao She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Vols. 1 & 2.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 刘红军:《〈儒林外史〉明代背景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
- [ Liu, Hongjun. *A Study of the Ming Dynasty Background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 刘廷玑:《在园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 [ Liu, Tingji. *A Miscellaneous Note of Liu Ting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
-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 Liu, Yongqia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 [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
- 陆应阳 蔡方炳:《广舆记》,《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 Lu, Yingyang, and Cai Fangbing. *Geographical Handbook of Late Imperial China. Books Listed as “To Be Banned or Destroyed”* by the Editor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Histories. Vol. 18.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7. ]
- 申时行等:《大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89—7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 Shen, Shixing, et al.. *Collected Regulations of the Great Ming.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789—792.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 宋濂:《宋濂全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 [ Song, L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ong Lian*. Vol. 3.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 苏轼:《苏轼诗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 Su, Shi. *Collected Poetry of Su Shi*. Vol. 4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 脱脱:《金史》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 Toqto'a. *History of Jin*. Vol. 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 吴敬梓等:《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李汉秋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 Wu, Jingzi, et al.. *A Collection of Collation and Commentary o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Ed. Li Hanqi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 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李汉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4—39。
- [ Wu, Zuxiang. “The Thought and Art of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Collected Papers o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Ed. Li Hanqi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4—39. ]
-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 Xu, Ke. *Classified Collection of Qing Notes*. Vol. 1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 徐树丕:《识小录》,《涵芬楼秘笈》第一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
- [ Xu, Shupi. *Records of Little Knowledge. Han Fen House Secret*.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16. ]
- 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 Ye, Mengzhu. *Records throughout a Lifetim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1977年。
- [ Zhao, Erxun, et al.. *Draft History of Qing*. Vol. 1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6—1977. ]
- 张廷玉等:《明史》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 Zhang, Tingyu, et al.. *History of Ming*. Vol. 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 左懋第:《左忠贞公剩稿》,《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二十六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 [ Zuo, Maodi. *Remaining Drafts of Zuo Maodi. Collection of Shandong Literature*. Series 3, Vol. 26.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责任编辑:程华平)